

北大为证

关于现实与自我的心灵对话

谁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生产“知识产品”的功利主义者，谁就比同辈人高出一节。

改革之前的体制有两个最大的失误，第一个是计划体制，这使经济失去动力，第二个是人为的男女平等，这使中国男人失去了性感。

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权力的相互制衡，要以权力来制约权力，说白了就是与其相

的良心，不如不给他犯错的机

的老师都会落伍，我们最需要提的一个口号是“向独生子女学习”。

当人们发现在喊“全心全意”、“真诚到永远”的是商业广告时，真不知道大学的伦理课怎么讲。

二十世纪对政府干预的失望，表明了市场选择是到目前为止，解决利益冲突最好的一种办法。

对资格优先权的争夺，意味着“资格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福利”，博士的背后是十年寒窗，官员的背后是多少年的委曲求全？

当道德名声不值几十元钱的时候，所有的救助恐怕都难以起作用。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滨
封面设计：三木广告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为证/袁方,姜汝祥编.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5

ISBN 7-80100-414-0

I . 北… II . ①袁…②姜… III . 社会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391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河北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34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0 册

ISBN7-80100-414-0/Z·55

定 价:28.00 元

致谢

1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请教导师袁方教授的一个记录。在博士论文完成时，我在前言上写到：先生的教诲将会伴随我一生的为人和为事。几年过去了，我想说，先生就像是我前方的一盏灯，它使我时时反思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2 从文稿到成书，这一过程凝聚着许多人的努力和心血。首先是纵横商务管理研究院的文硕院长，他一直在为自己“塑造中国‘兰德’思想库，以实业促学术”的理想而不懈地努力，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本书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推出。本书的平面设计和大量摄影，是由《国际人才交流》美编刘长

春完成的，我想说，本书并没有充分表达这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高材生的才华，如果时间再充裕一些，他会使本书更精彩。

3 责任编辑高滨先生为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严肃认真、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使我深为感动，在他身上我真正地感到了什么是“职业精神”。我还要感谢北京三木广告公司从事平面设计的吴丽萍，王益兰小姐的努力，她们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另外北京科技大学的袁弘同学，刘继云同学帮助我整理了大量的录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歆同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杨小瑞同学为我提供了大量图片，在此致谢。

4 现在的对话主要是依据当时的日记和文稿整理的，我深感遗憾的是先生有很多精辟教导，我只能写出当时记下的部分，有很多都遗漏了。最后我要声明的是，由于现在的这些对话文字主要是我整理的，所以如果文字、内容存在错误和欠妥之处，全部由我本人负责。

姜汝祥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凌晨三时于展春园

序

今年是北大百年校庆，我也正好八十岁。对于个人来说八十岁是老年，而对于北大来说，百年恐怕不过是周岁，在历史的长河中，北大的百年不过是与国家和民族共同成长的一个开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外强欺凌和军阀混战的痛苦，也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和昌盛。我想，北大精神的灵魂是爱国，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存亡联在一起，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我的博士生姜汝祥将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谈话整理出来，准备出版，我很高兴。因为是整理过去的东西，加上时间紧，这本书中肯定免不了有很多错误和疏漏，书中也存在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了，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八十年的中国人，看到国家正在走向富强，人民生活正在变得更好，我很想抓紧时间，为人民多做一点事。

世纪之末，赤子之心，燕园为证。

袁方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五日

ABT-75/91

北 大 为 证

关于现实与自我的心灵对话

第一篇

警惕英雄

警惕英雄：
致力建设之路





在北大做博士论文期间，因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有关本世纪地区社会变迁的，这样我需要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一些自己判断，为此写了一个提纲《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几点认识》。

这个提纲可以说是我的思想有别于八十年代的一个小结，转变点在于将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并认为对“建设之路”的威胁主要来自那些呼风唤雨的英雄。影响我这一转变的主要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提纲中我主要提出了这么几点：

1. 中国文化有没有出路，在这点上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即中国的危机是一个文化危机，而解决文化危机的出路在于中国社会本身，与梁漱溟先生不同的是，我对民治内容的看法上基本上认为梁漱溟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

2. 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认为基本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缺乏一支可以支撑的实际力量；二是知识分子更多地承担了外引的任务，而远离了内生的使命。

3. 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怎么从操作的角度来完成对道路的选择和把握，我提出了建设之路上的操作论问题。

4. 在“建设之路”上，各种潮头都有可能改变轮船的航向，我认为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警惕那些自命不凡的英雄。

1.1 知识的市场定位：早熟的新文化运动

最近我在准备论文的思路背景，我很同意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姜汝祥），这就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外来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原有的问题圈内循环。

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由一些新生力量的发展壮大而推动的

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由一些新生力量的发展壮大而推动的，但在1840年以前，新生的精英总是以修复旧的框架为己任，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偶像的认同，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中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资本主义”。

从“国家”的意义上看，正如“自我”的概念是通过交往关系引起的一样，“国家”这个概念也是通过文化交往和冲突才明晰起来的。中国人的“国家”概念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起始，是从鸦片战争中的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之后才有的。

改良运动：沸腾的血画了个饼

·1840年后的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与“培养现代公民”这

样两条道并行，洋务运动看到了西方列强“器械的先进”，但它仍然要“中学为本”，结果只是妄想。

·许多保守派并不反对作某些改革，荣禄曾上书建议改革。只是诏令接触具体改革时，保守派才改变了看法，中间派意识到改革会危及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起来反对光绪皇帝

·中国旧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政治上是一人在上万人下下的局面，没有阶级所以不能用武力统治，只好靠教化和礼俗维持。



姜：从洋务运动起，1840年后的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与“培养现代公民”这样两条道上，进行着艰辛的努

代表新生力量的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君主立宪”，这使中国社会开始摆脱了“历史偶像”的认同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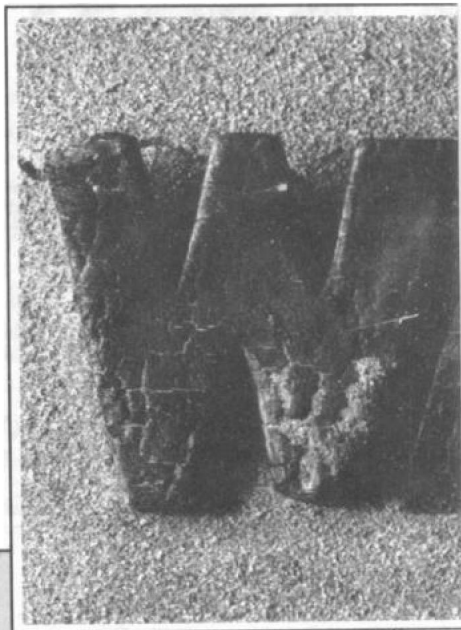
力，洋务运动现代有了定评，它的历史功绩是看到了西方列强“器械的先进”，欲在武器上引进西方技术，它的局限在于仍然要“中学为本”，但结果正如汤因比感慨的那样，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它方面保持原样，这是妄想。

因而新生力量，也就是致力于通过公民培养而使国家强大的力量的出现，是在洋务运动之后，代表新生力量的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君主立宪”，这使中国社会开始摆脱了“历史偶像”的认同框架，改良派的这一主张是新生力量的第一声啼哭。

袁：如果从现代化理论看，“君主立宪”所遇到的阻碍是结构性的，这不仅是清朝中央财政能力已经不足以获得对地区经济的调控，而且在社会一体化方面，如社会分化、定居、社会组织 and 资源动员能力等方面，都没有为十九世纪的变革作好准备，这样“君主”的力量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

姜：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兰比尔·沃拉对此有一个评论，他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要以为光绪皇帝一开始就违抗慈禧的意愿，恰恰相反，在颁布确定新政权主要方针的第一次改革诏令前，他已同慈禧商讨过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事实上，许多保守派也不反对作某些改革，甚至荣禄也曾上书建议改革。只是当诏令



诅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诅咒自己，仗到处在打，然而各省的事务却照常。

开始接触具体的改革建议时，保守派才改变了看法。当中间派意识到改革会危及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时，他们便起来反对光绪皇帝。

袁：这一评论给我们画了一个虚幻的大饼：如果光绪皇帝和慈禧能够齐心协力，争取中间派，把保守派“改良”乃至消融，中国现在可能成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



姜：是的，寄希望于这种假设只能说明我们结构上的障碍。梁漱溟先生对此也做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国旧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政治上是一人在上万人下的局面，没有阶级所以不能用武力统治，而只是以教化维持秩序，不好以法律强制，只好以礼俗维持。

换句话说讲，即便光绪皇帝和慈禧能够齐心协力，问题是谁来支撑这种变革呢？梁漱溟先生在这里独具慧眼，他指出了近代中国的君主立宪，无论在文化构造（教化和礼俗）还是阶级动力的支撑上，都缺乏应有的准备。

这种缺乏在民国初期出现的一批军阀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人人诅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诅咒自己，仗到处在打，然而各省的事务却照常，可见这种战争只是个人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没有丝毫的阶级背景。

袁：王朝崩溃的危机是整体性的，特别是对比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费正清提醒的重要性，这就是今天10亿左右的欧洲人生活在近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当我们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些词语用于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就是说，十九世纪的外来压力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诞生并强化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这种从文化上产生的民族主义，与从政治结构上产生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法律后的“理”和道德，以及人们的行为习惯，其变化就远比那些外在的现代化指标要缓慢得多。

知识定位：早熟的新文化运动

· 中国文化的“滞后”和“超前”，其发生的机理似乎是不一样的。滞后往往是民众创造的，而超前却是一部分靠“知识”

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思想深度恐怕现在也难以达到。



为生的人创造的。

·为什么总有人要“独尊某术”，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术”对他的统治大有好处。

·所谓灵活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不同阶层意识的表象，没有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多种类的利益群体，就没有“灵活的意识形态”。

姜：从这种历史的结构变化来看中国的发展，会感到文化的“滞后”和“超前”，其发生的机理似乎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爱讲这两种现象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事实上它们的制造者却大不一样，滞后往往是民众创造的，而超前却是民众中的一部分靠“知识”为生的人创造的。

所以正如梁漱溟先生说的，诸子百家所造就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一样，我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早熟的文化繁荣。这种早熟的依据有几点，比如这一文化缺乏应有的发育期，它是一种突变，因此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思想深度恐怕现在也难以达到，所产生的那一批文化巨人不但二十世纪后半期无人能比，就是二十一世纪，我看也未必能有这样一批人出现。

另一个论据我们可以从反面看到，这就是新文化并没有真正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灵魂，以至于还有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焚书坑儒”的再现，以至于了一批被五四精神激励出来的后辈，走的却是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路。

袁：文化有其延续性，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它离不开具体的政治经济结构，说白了，就是利益的作用，为什么总有人要“独尊某术”，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术”对他的

统治大有好处。

所以诸子百家和新文化能够出现，至少不能忽略政治结构的松动，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统治真空，而且各个阶层都想找出一条“救国之路”。事实上文化繁荣与政治结构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只是诸子百家和新文化运动，每一个旧王朝崩溃和新王朝诞生之际，都会促进新文化的诞生。

姜：这样看来，新文化的出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本就是由于利益差别引起的地位分化和权力分化。由于社会结构中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优势，使得统治者可以“设计”一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加大“意识形态灵活性”的成本。

意识的认同作用事实上是在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中作为节省交易费用的“供给物”而逐渐扩散的，这就是“阶层意识”：价值对规范的替代。所谓灵活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不同阶层意

比如梁漱溟（右二）、辜鸿铭等等，在新文化运动中仍然高举传统大旗，有趣的是在中国真正开始大规模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时，在文化上却出现了对这一批“反现代文化传统者”前所未有的兴趣。



比如梁漱溟（右二）、辜鸿铭等等，

识的表象，没有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多种类的利益群体，就没有“灵活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想新文化的出现源于统治群体的崩溃，而新文化的早熟恐怕也源于这种崩溃，没有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多种类的利益群体的支撑，最终还是逃不掉昙花一现的命运。

高山立桥头，火车打转转

· 谁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生产“知识产品”的功利主义者，谁就比同辈人高出一节。

· “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并没有天然的“沟”，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第三者”是影响个人经验的重要因素

· 梁漱溟、辜鸿铭等人并不是真的反现代化，而是在提倡一种本土精神与外来文化的混合、连接或融合。

· 为什么“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后期，高举反传统大旗的不少文化精英，都被功利所收买？周作人是一个极端，现在的一批所谓儒商也是一个极端。

袁：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标志着现代文化在中国的确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无法否认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姜：只是有些无法超越。

袁：在这一点上，你可以借鉴一下林毓生对五四运动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转接作用的分析。他认为“五四”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全部解体的困境中作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



在与现代文化的对峙和冲突中，本土文化才真正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他称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强势，我觉得不如用功利一词更好，这有些类似于你想在博士论文中表述的“价值替代规范”式的一种追求。

姜：的确，林毓生在这一点上是有见地的，当他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生产“知识产品”的功利主义者时，他就比同辈人高出了一节，

尽管他的逻辑仍然很混乱，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比如他认为“五四”这批知识分子在生产新文化运动时的动

专 栏

亚洲价值观辩证谈

近几个月来，由于金融危机一直困扰着东亚，一些政治家、出版物和权威评论家都在嘲弄“亚洲价值观”，暗示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造成他们目前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这些国家成功的原因。

亚洲和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英语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我”(I)这个词一出现，就要大写，而“你”(YOU)就处于次要位置，相比之下，从传统上说，在汉语中则是相反，“本人”常常要写得比其他字小一些，而且要写在一侧，特别是中国文明，个人处于组织之下，由于家庭如此重要，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有无数不同称谓。

力，是深受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刺激而对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产生强烈的疏离感，但这一动力在思维方式上，却又依附于传统的一元化思想模式。这两种逻辑上似乎矛盾的东西在那里，通过将形式和内容分别独立处理而得以协调。

但他显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系统在创造新文化中的作用，主要是处于一种“借用”的地步，当新文化运动采取几乎是全盘西化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时，它的出发点就不可能完全出自“传统思想”。

无论是表达形式也好，表达动力也好，传统文化的地位都只是被“借用”，“新的”和“旧的”重合程度实际上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成本中还有以既得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还有“价值替代规范”的成本，那些与个人经验相近的意识形态，显然有着较小的接受成本。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其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罗珀-斯塔奇公司在35个国家向3.5万人征询了意见，结果表明亚洲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菲律宾，尊敬先人被认为是孔子传授的最佳美德，很难想象西方国家会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也很难想象像节俭、勤劳和孝敬父母会成为这场经济动乱的根源。就象某亚洲国家领导人过去讲“我们的价值观胜过你们的价值观”不太恰当一样，在今天看来，西方的指责也是不合适的，亚洲的价值观像其它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价值观可能比另一些价值观更为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价值，而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